追忆家父萧蘧

○萧庆伦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谜。我的父亲萧蘧在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14年，在5年间（1930—1934），他先后担任经济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以及清华教务长；但是之后的9年（1935—1937以及1939—1944），他就再也没有在清华担任什么行政职位。原因为何？

十几年前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和陈省身教授那次晚饭，颇为解惑。当我问起家父萧蘧在清华的那段历史，陈教授笑着说，“是年轻的老师把他选下来的。”陈教授比我父亲小14岁，父亲在清华当教务长时，陈省身在清华任教。陈教授告诉我，“当时在清华，关于如何治校，大家有不同的观点。你父亲是在美国受教育的，他想用美国办大学的方式在清华治校。他提倡教授治校，民主选举校领导，赋予教授自主权。我们有些年轻的老师，是从欧洲回来的，治校理念跟你父亲不同。我们和你父亲谈，但他是个坚守原则的人，不肯让步。我们年轻老师组织起来，把他选下来了。他受了很大的打击。”

和陈教授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些许清华治校的分歧，也可以猜想到当时国内政局变化万千、校领导频繁更迭之状况。欧美派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年轻和年长的老师们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家里并没有保存父亲的什么档案，我希望在公共档案里可以找到答案。一份清华档案里面只提到父亲曾担任文法学院院长，没有提到他曾经担任教务长。但我确实知道他做过清华教务长，因为他的同事后来跟我提起过。

我在哈佛图书馆查了一些关于父亲的资料，再加上零零星星的日常资料积累，将父亲生平简述如下：

父亲萧蘧，1897年生于江西泰和县，字叔玉，后来全家搬到上海。父亲在圣约翰学校毕业后考取清华学校。1918年，由清华学校选拔为美庚款留学生，此次留学学监为梅贻琦。到美国后，在密苏里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并被选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会员。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最终被哈佛大学录取为经济系博士生。1925年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正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金融和国际贸易。1947年3月，前往美国纽约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经济顾问。1948年底，在纽约病逝。

父亲在哈佛大学期间，师从经济学家陶锡阁（Taussig），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后，在校写论文，但有一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时中国留美同学会的会长涉及一个假支票案件，被查获并被逮捕。父亲作为中国留美同学会的骨干之一，组织援救这个同学。最终，检察官同意和解，但是勒令遣送这个同学回国，同时需要有人监护以保证这个同学确实回到中国而非半路逃脱。大使馆不愿意担当这个任务，中国留美同学会寻找监护人，但也没有人自愿来承担这个任务。父亲说他可以护送这个同学回国。当时，他和导师陶锡阁商量回国事宜，陶锡阁也同意他回国做论文。但他回国后就到南开当了教授，并任文法学院院长等行政工作，因此没有完

成他的博士论文。

1930年，父亲离开南开大学去了清华大学，在这期间他的生活很愉快，因为能和几位留美时的好友在一起教书，如陈岱孙、金岳霖、周培源、赵守愚等。那时候教授的待遇很好，课后我父亲喜欢骑马和郊游。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进入国民政府，在资源委员会工作。但这个工作他只做了几个月，因为他发现在一个官僚体制下，他很难实践自己的理想和抱负。1938年，他辞职后去了云南大学，担任“英庚款”教授。1939年，他回到西南联合大学，我们家从昆明城搬到乡下去住。那时家里经济并不宽裕，父亲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给姐姐买的洋娃娃，都在昆明典当了，以补贴家用。我们住的是农户的房子，在西山脚下，屋里是泥地、泥墙，院子里可以养鸡。家里6个孩子，大概每隔一天能吃一个鸡蛋，每个礼拜吃一次肉。冬天，窗户用报纸糊上，有些阳光进来，但是没有风。夜里着实让人害怕，狼就在窗户下面嚎叫，还不停地抓墙。

记得父亲喜欢穿蓝布大褂，抗战爆发

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教授，左起依次为：陈岱孙、施嘉炀、金岳霖、萨本栋、萧蘧、叶企孙、萨本铁、周培源

后，物资短缺，大褂洗得都褪色了，也打了很多补丁，他照样穿着去讲课。当时参考书很少，父亲把家里的几本带到学校，学生可以借去做参考书。为了节省纸，他让学生记笔记时只记重点，不用记细节。

他每周走路绕过翠湖、滇池，走几个小时去昆明城里上课；回家时，从城里扛米回来。我小的时候很期待父亲回家，他一回家，家里就有了生机和活力，他时常带我们去爬西山。虽然那时没有钱，但桃子上市时，父亲会买几个回来，做西式的桃子派，因地制宜，用很粗的面粉做，放在火灶里面烤。虽然有时会烤焦，父亲做的桃子派让孩子们觉得很幸福。

老照片会给人一种错觉，仿佛时间停滞了。看着照片中的一个小伙儿（左1），身材修长挺拔，穿着从英国定制的Harris Tweed西服，帅气极了，你很难把他和“中国经济学泰斗”这个头衔联系起来。他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陈岱孙教授。父亲和陈岱孙是哈佛大学同学，在清华任教时也是好友，他们跟马寅初也很熟。在西南联大时，陈岱孙教授、生物系教授李继侗，还有外文系教授陈福田，他们常常带着自家的米和二两肉来我家。吃过饭后，在菜油灯下边打桥牌边议论时政。有的时候是三缺一，他们教我打桥牌。我只会叫牌，而不会打牌。我上世纪80年代回北京时，陈岱孙教授见到我说：“记不记得以前我教你打桥牌？”我当然不会忘记，当时西南联大教授生活拮据，自带口粮打桥牌议时事。

在深夜，等我们熟睡以后，父亲和母亲商量如何安排捉襟见肘的生活，有时会吵起来。记得有一次母亲说，要和

梅贻琦校长说，先领一点薪水用。但是父亲拒绝这样做，他说，“大家都很困难”。当时是5月了，但是1月的薪水还没有发下来。

抗战后期，通货膨胀越发严重。很多教授都要做兼职补贴家用，父亲也翻译美国的新闻稿，还给要出国的高级官员培训。虽然生活很拮据，但西南联大教授们还是经常来我家商讨国是，针砭时弊。父亲直言不讳地批评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大家辩论中国的将来是共产党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不伤感情。我想一个主要原因是每个教授都很正直，是为了公益而非私利在辩论。

1944年，父亲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正大学校长。当时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县，日本人打到了江西，他便带领全校的师生，携带图书和仪器，迁向江西的农村和山地，继续办学。那时他的哮喘很严重，但仍然勤奋工作，在中正大学的校友通讯中，有多篇文章记载他。抗战胜利后，中正大学复校于江西南昌，让他度过一年稳定的生活，聘请了国外的教授，添置图书和仪器，并且用美国大学的治理方式来治校。当时，学潮四起，物价高速上涨，通货膨胀惊人，很多学生没法承担高昂的生活费和学费，但政府也没有钱补助他们。同时，国民党的三青团和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各个大学校园里斗争。1946年底的沈崇事件发生后，学潮更是如火如荼，蔓延至全国。在动荡的格局中，父亲始终以教育为业，他从来不怕得罪人。抗战时国民党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江西教育厅的厅长鼓励知识青年从军，说“越多越好”，萧蘧作为校长说：“抗战救国，匹夫有责，但大学乃培养国家所需各类人才之园地，有志从军者可踊跃报名，有志专业者不必勉强。留下来读书，也是一个选择。”我越来越理解父亲在清华治校分歧中的不妥协。

1947年2月，父亲辞去中正大学校长一职，清华大学聘请他任教。1947年春，我们家所有的行李都已经运回了清华园，但父亲的留美同学蒋廷黻请他到纽约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经济顾问，为期两年，他辗转前往美国。

1948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闭幕后，父亲从巴黎回纽约，受了伤寒。他的哮喘因感冒而严重，治疗中因医疗事故去世。

父亲萧蘧一生和清华很有渊源，但我不能确切描述他为清华作了什么贡献。不过，有一次在哈佛和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谈话中，我能感觉到，我的父亲，一个老清华人，为校、为国尽了绵薄之力。他说，“你父亲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很热忱，并重视培养年轻人。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想留在中国，对中国有更多的认识。他聘请我在清华当了助教，并指导我如何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追忆父亲，他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那正气凛然的为人处世风格。他在西南联大教课时，有几个学生没有及格，到我们家里来说情，带了火腿罐头、饼干等。我们孩子们看了口水直流。但我父亲无以为动，训导这些学生一番。

父亲萧蘧，一生恪守原则、耿直热忱。他精力旺盛，很有事业心。业余喜欢桥牌，喜欢骑马、爬山。

2010年12月于美国剑桥